从理想空间到异质空间——介绍大卫·沙恩的新的城市概念模型

From Utopias to Heterotopias: Introduction to David Shane' s New Urban Conceptual Model

李海涛 赵霞
Li Haitao, Zhao Xia

摘要：本文介绍了大卫·沙恩的新的城市概念模型，即城市的发展变化可以由领地、骨架和异质空间三个基本元素的组合和重组进行解释，其中异质空间在稳定城市和刺激城市模式转换中起到关键作用。创建异质空间，是城市建设参与者和城市设计者实现其理想的重要手段。

Abstract: This is an introduction to David Shane’s new urban conceptual model which explains the urban model shifts with the combination and recombination of three basic urban elements: the enclave, the armature, and the heterotopias that play key roles both in stabilizing cities and in catalyzing transitions from one city model to another. To create heterotopias is very important to urban actors who want to realize their “utopias”.

关键词：城市概念模型；领地；骨架；异质空间

Keywords: Urban Conceptual Model; Enclave; Armature; Heterotopias

作者：李海涛，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城市规划师。Lhtgd@sina.com
赵霞，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城市规划师。Zhaox-caupd@163.com

导言

人们是如何认识、管理和改变他们所处的城市环境的？按照凯文·林奇在《好的城市形态》中的说法，人们使用城市概念模型（urban concept model）以便在复杂的城市环境中产生秩序；而一个模型就是关于环境应该如何被创造的图景，一个可以被当作原型遵循的形态或者程序的描述[1]。在不同时期，人们创造了很多城市模型，例如，林奇在《好的城市形态》中描述了信仰城市、机器城市和有机城市三个标准城市模型，分别对应前工业时代、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城市；后来荷兰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协会召开的青年规划师会议分别用第一城市（Archi Città）、机器城市（Cine Città）和信息城市（Tele Città）来描述三个不同时代的城市模型[2]。这些模型是非常清晰、简洁和容易理解的，但它们也是静态的，本身无法解释和描述如何从一个城市模型转换到另外一个城市模型。

1962 年，克里克（Crick）、沃森（Watson）和莫里斯·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因为 DNA 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他们关于基因重组的概念，引发了当时还是学生的大卫·沙恩①的灵感：带有遗传密码的、可遗传的、可变的氨基酸顺序一旦改变，有机体的结构也将改变；那么，城市中很可能也存在类似的机制影响到城市的发展变化。经过多年的研究，2005 年，沙恩出版了他的著作《重组城市主义：构建建筑学、城市设计和城市理论中的概念性模型》②，提出了一个新的更为基本的城市概念模型，如同 DNA 重组可以解释生物体的变化一样，可以用来解释和描述城市的发展变化，尤其是针对欧美当前（后现代）的城市状况。

1 新的城市概念模型

沙恩认为，不管在何时何地，每个城市都包含三种基本元素，即：领地（Enclave）、骨架（Armature）和异质空间（Heterotopias）；城市建设参与者（Urban Actors）按照各自的价值观，组合和重组各类城市元素（包括上述三个基本元素以

① David Grahame Shane 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保护学院、Cooper Union 和纽约城市大学的建筑学兼职教授，主要作品还包括《1945 年以来的城市设计：一个全球视角》（2011）和《城市的谱系》（2009）等。

② 本书被不少学校作为建筑学、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的教科书。笔者和中规院其他同事 2008 年在 UCLA 学习时，Aseem Inam 教授用这本书作为教材专为我们授课。

及其他次级元素），以创造适应需求的新城市环境。其中，异质空间在稳定城市和刺激城市模式转换中起到关键作用。

1.1 领地（Enclave）与骨架（Armature）

领地具有七个要点：(1）它们具有明显区别于周边环境的内部空间秩序和社会秩序；(2）位于其中的特殊吸引点赋予其有别于他处的特征，并与理想的或者遥远的社区相关；（3）它们具有围绕着其特殊吸引点的周界或者边界，用以限定其内部空间秩序的范围；(4）边界上设置大门，连接交通和通讯通道，以便进行内外沟通；(5）它们是流动性要素聚集、停止并达到平衡状态的地方；(6）在其边界内，可能有很多种城市类型形态，但却主要被一种不断重复的模式所主导；(7）它们具有守门人和系统化的内部规范，限定这个领域内的社会和功能秩序专门用于特定的人群和用途。“总的来说，一个领地是一个由城市建设参与者创造的、自组织的（self-organizing)、自我为中心的（self-centering)、自我调控的（self-regulating）系统，经常是在设定的边界内，由一个严格的统治体系进行管治。它利用一系列的技术，包括围墙、看门人、殖民地规划中整齐匀称的几何图案等，减缓和集结城市中各种游动的流。”[2]177 简单地说，领地是城市中有边界围合的空间，大量存在于城市中；只要具备与周边环境区分出来的条件，一个小区、大院、学校、建筑，甚至每个房间都可以看作是领地——这取决于分析的尺度和层次。

骨架是城市中分门别类（Sort）并按序列安置（Arrange in Sequence）次级元素的线性系统[2]199。简单地说，骨架就是一个系统的骨脉，是具有组织能力的线性空间要素，能够容纳、引导城市中的流动性要素。在城市或者都市区层面，城市轴线、道路、河流、铁路和互联网络等都可以被视作骨架；在建筑中，电梯和走廊也可以被看作是骨架。

1.2 异质空间（Heterotopias）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且涵义丰富的概念，最早来源于医学上组织或者器官的异位，后来福柯在他的文章《在他乡：乌托邦和异托邦》(Of Other Spaces: Utopias and Heterotopias）① 中借用了这个概念并进行了哲学意义上的阐述。福柯的异托邦是与乌托邦（Utopia）相对的概念，乌托邦不是实际存在的地方（A Placeless Place)，而异托邦则是实际存在的地方，是真实存在、有效实现了的乌托邦，是能够同时表征（represent)、质疑（contest)、翻转（invert）其身处的文化中所有的其他实在场所的反场所（counter-sites)。二者都能够镜像反映更大的社会现实，人们从中可以看到反转了的社会秩序，使人们能够在一个不断变换和流动的世界中确认自身的身份和需求。例如，乌托邦是基于人们对现实世界种种不满而产生的可以寄托人们理想的地方，具有与现实世界相反（至少是不同）的社会秩序，促使人类不断调整自身行为而逐步改善现实世界；美洲殖民地城市则是当时欧洲殖民者建立现实中理想国的地方，以摆脱欧洲原有的种种不完美，是异托邦的案例。

沙恩从福柯那里借鉴并重新定义了异托邦（Heterotopias，在城市设计领域译为异质空间可能更为合适）这个概念。“每个城市系统都将保持一些与主导的逻辑相反的非常独特的地方，但其存在对于维持主导逻辑的可持续性是必需的。这些地方将在某些方面反转（reverse）处于主导地位的规范，容纳那些被处于主导地位的城市建设参与者们认为是另类的人群、物体或者程序。”[2]244 沙恩提出，异质空间是特殊的领地（城中之城），具有多中心的结构，内部能够微缩地反映背景系统的总体组织结构，但具有相反的规范，其功能是帮助维持城市的稳定和发展——通过排除和隔离颠覆性的元素，或者刺激城市从一种模式转换为另外一种模式以维持其生存，因此，异质空间对于任何城市都是非常重要的。

异质空间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不过也有三个基本特征（即三个“M' s”)：“镜像功能（mirror-function）——反转周边系统的规范，异质性领地中的多腔结构（multiple pockets）——能够容纳混合与变化，以及乌托邦化模拟（utopic simulation）——微缩反映（reflect in miniature）整个背景系统，但其规范是被改变或者反转了的。”[2]239

1.3 城市元素的重组与城市模型转换

在不同的文化、地方和时期，城市元素不断地被组合和重组，创造出新的城市环境。广场、宫殿、教堂（寺庙）与街道的组合，道路与工业区、居住区、商业区、绿地的组合，形成了不同时代的城市。城市元素的重大重组则产生新的城市模型。如果把历史上的城市简化为三个城市模型，沙恩认为其基本元素的组合可以用三个公式来表达：第一城市（Archi Città)= E/A + H1，意即领地主导城市，骨架是从属的；机器城市（Cine Città）= A2 / E2 + H2，意即骨架主导城市，领地是从属的；信息城市（Tele Città）= H3 / (A3 + E3)，意即异质空间主导城市，骨架和领地是从属的[2]281-293。

第一城市（或信仰之城）对应的是前工业化社会的城市，人们的空间观是等级分明、单一中心、有明确界限的。城市是有机统一的整体，总体特征是统一、静止、缓慢变化的，其领地（E1）占据主导地位，与骨架（A1）一样都是

① 这是福柯 1967 年专门针对建筑界的一次演讲的主要内容，1984 年他去世后才出版，引起了理论界的巨大反响。

有限、明确的空间，如连续的街墙限定出明确的广场、街道和轴线等。其中典型的异质空间是福柯所称的“危机性的异质空间”（heterotopias of crisis，沙恩称之为 H1），即前现代社会中的神圣或者禁忌之处，是给那些与社会处于危机关系之中的人们的，例如城市中心教堂边上的墓地、犹太人区、瘟疫患者所处的被隔绝的房屋等——这些异质空间的存在，排除和隔离了颠覆性的元素，保障了城市的稳定。

随着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家关于宇宙时空观（无限延伸的、均质的而非等级化的）的启蒙，人类逐步进入工业社会，早期逐步出现的工厂、监狱、医院、大学等福柯所谓的“偏离性异质空间”（H2，heterotopias of deviance）①，起到了刺激信仰之城向机器城市的转变。机器城市强调城市各类要素应该按照严格的逻辑（科学的或者线性的逻辑）进行有秩序的组织，是可以自上而下控制和设计的；骨架（A2）成为主导性的城市要素，是联系两个目的地（E2）的通道（如公路、铁路、水运系统），是组织各种“流”有序流动的关键；道路不再由周边的建筑限定，而是更为独立、容纳快速流动的“管道”。典型的领地（E2）则是单一功能的和专门化的生产、消费或者存储的场所（例如与其他功能区隔离的住宅区、工业区等），主导的规范是工业化所要求的严格纪律、清晰分类、井井有条、各行其道等，具有明显不同于前工业社会的特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早期的异质空间已经成为主导性的形态类型，而不再是另类，如单一功能的工业区、居住区、快速道路等早已成为城市的常态而非例外。

近几十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变化，人类逐步进入信息社会（或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更加强调多样性、灵活性、混合性，明显区别于工业社会的严格逻辑，信息城市或者网络城市开始涌现。从机器城市到信息城市的转换过程中，幻象性异质空间（H3，heterotopias of illusion）帮助反转了机器城市中处于主导的 H2 的规范，反映了世界从处理物质性的事物到在信息系统中处理象征性信息的转变。“幻象性异质空间……提供了一个非强制性的方式，通过与休闲、娱乐相关联的规范，使社会有序化。这些规范是灵活的，能够自下而上产自于新的、无线化的媒介自组织系统中，如同自上而下的传统层级一样。”[2]244, 245, 259, 293 H3 的特点是混合使用、多功能、灵活的、混杂的，允许城市元素明显随机地组合，提供了放松和自由的感觉，与现代工业城市严格的逻辑相反；更主要的特征是以图像空间（image-space）为核心，经常类似舞台布景，能提供一种优美、虚幻的空间意象，视觉形象非常独特——如迪斯尼主题公园、拉斯维加斯赌场、新城市主义的邻里和巨型购物中心等，其中的历史符号或者代表奢华与高端的媒介符号（品牌广告）往往来自他乡（信息技术的普及带来的重大影响），使得这些空间与遥远的地方（往往代表了一种理想）建立了联系。信息城市或者网络城市还在形成过程中，但近几十年来，H3 所代表的城市片段，已经屡见不鲜。

异质空间存在于城市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既作为城市稳定发展时期的稳定器，也作为从一种模式转换到另外一种模式的催化剂，根据其所处的文脉而不断变换其作用和形式。异质空间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并且是不断变化的。第一城市、机器城市、信息城市等仅仅是简化的代表性模型，实际存在的城市模型多种多样，而每一个城市模型都有自己的异质空间，因此异质空间也是多种多样的，不能仅仅局限于上述提到的三种类型和案例。可以认为，只要符合异质空间的基本特点（容纳另类、反转主导规范等），都可以看作是异质空间。

1.4 适于后现代城市的设计方法

已经初露端倪的网络城市或后现代城市展示出非常复杂的面貌。沙恩认为，在后现代城市中，没有人能够控制或者协调整个城市（总体规划已死）；存在很多独立的城市建设参与者，每个参与者都是在既有的结构上增加他自己的新系统作为新的一层，形成多层的（multi-layered）断面结构；城市是一个混乱无序的反馈系统（chaotic feedback system）和异质性片段的大杂烩（patchwok of heterogeneous fragments）；只有局部的秩序（local order）而总体上没有明显的秩序。

那么如何在后现代城市中进行设计？沙恩在他的书中提到了七种后现代设计方法——剪贴（decoupage）、拼贴（collage）、成品拼贴（bricolage）、图像蒙太奇（photomontage）、蒙太奇（montage）、装配（assemblage）和根状装配（rhizomic assemblage）[2]138-151。这些方法都通过重组城市元素形成新的城市片段，但具有不同的重组逻辑——前面五种方法还会保持一个可整体认知的形象，后面两种方法则更强调局部而不强求整体的统一。他认为“根状装配”最适合后现代城市的状况，因为后现代城市是多中心的、多层的，很多具有不同价值观和规则的城市建设参与者主导着不同类型的城市片断。“根状装配”通过采用多条叙事线索，没有总体控制的、现成品的拼贴和与环境相适应的弹性来满足后现代城市的复杂性要求，既包括自上而下也包括自下而上的手段。如屈米设计的拉维莱特公园，艾森曼、盖里和哈迪德等设计师的一系列解构主义建筑作品，反转了

① 按照福柯的说法，现代社会中“偏离性异质空间”代替了“危机性异质空间”，是那些行为背离了社会要求的人们所处之所。

通常的规范和传统的层级，具有非线性的逻辑，呼应了后现代城市的基本特征。

2 启示与思考

沙恩提供了一个新的概念模型，包括三个基本的城市元素，这些元素能够在不同时期被具有不同价值观的城市建设参与者组合和重组，形成其自己的片断或者城市。这是一个深层次的模型，能描述和解释城市变化的机制和过程，而不是一个可以直接告诉别人如何建设城市或城市片断的外在模型。在三个基本城市元素中，异质空间在推动物质和社会空间变化方面作用最大，对城市建设参与者和城市设计者也最具有启发意义。

世世代代，人们追求理想城市、理想空间的努力从未停止，异质空间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了那些不满足于现状的城市参与者的愿望和乌托邦理想，为他们的实验提供了必要的空间，而这些实验一旦成功则将推广到更大范围，从而替代原有的主导模式。因此，不断创建异质空间，是社会、城市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摆脱“乌托邦”困境的有效途径。

异质空间的概念是抽象的，但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存在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中国在 1980 年代早期建立的四个经济特区就是异质空间的例证。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这四个当时的经济特区作为试验田进行市场经济的尝试（当时计划经济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30 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经济体系已经基本转化为市场导向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特区已经不再是“异质空间”。此后，我国一直不断设立新的“特区”，先行先试新的发展政策和模式，如海南特区、浦东新区等，最近的案例则是珠海的横琴新区和福建的平潭综合实验区等。可以认为，这是中国特色改革开放道路中，最有价值的空间和政策实践之一。关于异质空间的理论，似乎可以成为这些探索的理论依据之一。

对城市设计者而言，一个好的城市设计，就应该是创造一个异质空间（但异质空间不一定就是好的城市设计），改正现有主导规范的某些缺点，创造出新的规范。而要创造这样的空间，就要充分把握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解析现有主导规范与之不适应的地方，在新的空间中进行创新实验。同时，可以对现有的异质空间进行解析和学习，以便发现哪些反转的规范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如在一个汽车主导的社会中，步行系统、自行车系统是绝对的“另类”，但在绿色低碳等新的社会理念下，建立方便舒适的慢行系统、设立步行优先区域等，是一个好的城市设计要考虑的重点内容。

对于城市现有的异质空间，需要进行多角度的深入解析，将其作为镜子反观我们固有的规范，才能判断其价值和需要改变的地方。如现在很多人都已认识到，城中村等异质空间的存在，一方面反映了城乡二元制度的不合理、保障性住房缺失等制度性问题迫切需要在政策层面予以解决，另一方面起到了提供低成本住房，甚至在部分地区具有保存地方传统等作用，因此针对城中村的改造政策需要更加全面的考虑。实际上有的地区已经在探索把城中村或城边村纳入到城市发展有机体中的具体路径，践行城乡一体化、田园城市等新理念，出现了新的城市形态（如成都的“五朵金花”示范区域）。

《重组城市主义：构建建筑学、城市设计和城市理论中的概念性模型》一书中关于欧美当代城市（后现代城市）以及城市设计方法的很多观点值得思考。其中，多中心并不仅仅指多个城市中心出现，也意味着很多建设主体在城市空间片段中发挥主导作用，而不再是一个声音、一个机构主导城市。当前中国城市碎片化、多中心的趋势比较明显，与此同时城市政府自上而下的规划控制还比较有效，总体规划尽管面临挑战但并没有“死亡”。在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的今天，要避免无序和混乱，更需要发挥总体规划控制的主导框架作用，这也是中国城市的一个优势。另一方面，总体规划控制也应更具有包容性和灵活性，求同存异，给众多不同主体以发挥的空间。UPI

参考文献

[1] Kevin Lynch. Good city Form [M].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84: 277.

[2] David Grahame Shane. Recombinant Urbanism: Conceptual Modeling in Architecture, Urban Design, and City Theory [M]. Wiley-Academy, a division of John Wiley & Dons Ltd, 2005: 71-72.

[3] 斯皮罗·科斯托夫 . 城市的形成——历史进程中的城市模式和城市意义 [M]. 单皓 ,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2005.

[4] 尚杰 . 空间的哲学：福柯的“异托邦”概念 [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3): 18-24.

[5] 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s (1967), Heterotopias [EB/OL]. [2012-07-20].http://foucault.info/documents/heteroTopia/foucault.heteroTopia.en.html